

跳出遗迹看敦煌

□ 金振蓉



《敦煌艺术通识课》，杨琪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杨琪先生，出版了一本《敦煌艺术通识课》读本。书的开头就很能打动

人，“我们不要急急忙忙地进入洞窟，可以先站在敦煌石窟对面的三角山上远眺——你看，在旭日的照射下，那一排排洞窟，好像闪着万道金光。特别是那雄伟的九层楼，辉煌灿烂，使人心动。”接着，作者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漫漫黄沙之中，会有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它何时创建、何时全盛、何时衰败？为什么全盛、为什么衰败？这些被人忘却了的洞窟，何时、因为何事才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内游、出国游都很平常，但“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依然是很多旅游者的切身感受。怎样让旅游变得更 有品质，或者如何使旅游更加有趣，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些办法。旅游莫过于游山玩水、踏访名胜古迹，假如在出发之前，我们能读到像《敦煌艺术通识课》这样的书，旅游是不是就离“看热闹”远了一点，而多了些理性探究，旅游是不是也变得更 有意思一些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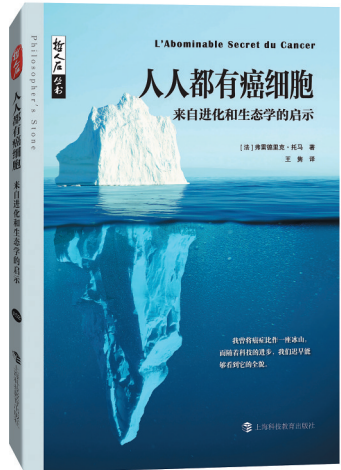
市场上，介绍敦煌的图书有很多，而且越来越精致，很多图片、视频都制作精美。虽然图书数目众多，但我想来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一是书的内容多为景点讲解，仅仅围绕景点做文章，通达古今的故事书却很少，这使大多数并非做学问的旅游者，读起来晦涩难懂。二是作者多为业内专家，围绕学术讲景点，深度有余、广度不足，特别是涉及人文领域不足，使景物孤立于时代背景，而要讲好历史故事，作者需要文理知识及出色的表达能力。

《敦煌艺术通识课》读本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需要对于遗迹本身的介绍，但更需要跳出遗迹看遗迹，把遗迹作为导引，串联起时代背景，以及活动于这一背景下的人和事，把遗迹变成一本鲜活的时代故事书。《敦煌艺术通识课》的作者正是这样做的，他有着精湛的专业背景，但并没有深陷专业学术，而是用通俗的讲解配以精美的图片，带领读者轻松地走进敦煌艺术的世界，感受敦煌的神韵，并围绕敦煌洞窟讲解世

界上最美的石窟艺术，让旅游者多了一份艺术享受。我把这类书称为“串讲科普书”。

在互联网时代，过去那种点状的知识科普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知识渴求，旅游科普书需要采用发散思维打通知识点，将科技、历史、人文等知识进行串联，从而让人们获得更大的信息量。串讲科普就是突破传统科普书的表达方式，更着重于在时代背景下的旅游景点介绍。这样的科普书相对于我国庞大的旅游市场，是一片亟待开发的蓝海。虽然这类图书在不断涌现，但数量上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我们的科普出版需要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大科普意识，吸引更广泛的作者队伍参与科普书创作。要让“牛人”乐于写“小书”，做大旅游科普书市场，让那些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旅游者，都能有一本心仪的书作伴，那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为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力促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人人都有癌细胞：来自进化和生态学的启示》，[法]弗雷德里克·托马著，王隽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癌症是当今生命科学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一般人却又不愿意提到它，因为它对健康的威胁太大，人们宁愿敬而远之。不过，掩耳盗铃终究不是办法，人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它，才能真正地减少它对健康的威胁。所以，对癌症知识的普及至关重要。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近百年来科学界逐渐涌现出一些发现、识别、杀灭人体内癌细胞的方法和技术，努力实施的结果确实也让部分癌症病人“战胜”了癌症。曙光初现，让人们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早期发现、准确识别、彻底杀灭”的抗癌方针。不过遗憾的是，人类距离“战胜癌症”仍是遥遥无期。严峻的现实提醒人们思考：我们对癌症的认识是否有误？

法国进化生物学家弗雷德里克·托马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并结合自己在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和海洋深处的观察结果，形成了与癌症成因有关的新理论：癌症并不只是一种疾病，而是进化的必然产物。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单细胞生物组成一个“克隆社会”，形成复杂的多细胞结构。部分细胞分化出多种功能，为这一多细胞结构的整体运作服务，但在监控机能缺失时，这些细胞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大量增殖，癌症因此出现。所以，癌症是细胞“背叛”的结果，它的出现是生命进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可避免。

托马据此写了《人人都有癌细胞：来自进化和生态学的启示》这本书，告诉人们：既然癌症是进化的必然产物，人类应该放弃“战胜癌症”的逻辑，试着与体内的癌细胞共存，甚至引导癌症的发展，将其对生存质量的影响降到最低。

这是一本从进化科学的视角来解释癌症的科普书，让人们重新审视对癌症应有的认识，写法上多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倒也生动有趣。这本书曾获第11届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科学品味奖”，出版社选择此书出版中译本，是很有限力的。

在医疗实践中，近数十年来对待癌症的治疗，事实上也在悄悄地起着变化。比如，外科手术从扩大手术范围以求根治，到追求根治与尽可能保存脏器功能并重；放疗、化疗从只考虑杀灭癌细胞到更注重患者的生活质量等；甚至如采用维甲酸等治愈某些类型白血病，也可视为改造癌细胞、“引导癌症的发展”思维的成功实践。

作为一名临床医师，从癌症的防治实践来看，癌症的预防当属首要之事。比如，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多种癌症的发生与烟草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控烟能明显减少肺癌等癌症的发病率，避免部分人群癌症的发生。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使用，能有效地预防高致病性人类乳头瘤病毒的感染，也就阻止了宫颈细胞群中“背叛”分子的出现，说明宫颈癌并非不可避免。癌症是“一组”疾病，它们有许多共性，但也有许多鲜明的个性。如部分前列腺癌被视为“惰性癌”，可以与宿主共存多年。但即便是前列腺癌，亦有少部分为急剧进展的、至少在目前看来无法与之共存的，在部分甲状腺癌中亦有类似的现象。而在其他癌症中，有此种共存机会的似乎并不多见。

人们确实应该从多个视角来进一步认识癌症，正如本书提示：既然难以“战胜”，可否争取与之共存？斯言善哉，人们当努力改造这种顽疾，“让癌症归顺，与癌症共存”。不过，以人类改造自然的可能来看，对于癌症，至少目前大约只能“剿抚并举”吧。

（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院长，健康教育学家）

蔡伦造纸惠千秋

□ 苏青

11月3日，在一阵清亮、悠长的号角声中，87岁高龄的著名纸史专家李玉华缓步向前，高声诵读蔡伦祭拜文，第二届衡阳旅游发展大会纸文化传承活动由此拉开了序幕。该活动旨在把握蔡伦造纸蕴含的创新理念，以此作为湖南省耒阳市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文化和智力支撑。

耒阳是纸圣蔡伦的故里，同时也是“诗圣”杜甫的卒葬之地，享有“荆楚名区”“三湘古邑”“汉白玉之乡”“油茶之乡”“楠竹之乡”等美誉，拥有我国连片面积最大的竹海，旅游业已成为当地重要支柱产业。

向蔡伦坐像敬献花篮、行鞠躬礼后，与会嘉宾、游客纷纷走进以油纸伞、岳州扇、南岳剪纸、滩头年画等非遗传承项目为载体汇聚成的纸文化长廊，参观蔡伦纪念馆，在蔡伦古法造纸技艺传习所体验古法造纸技艺的精妙，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蔡伦造纸惠及普通百姓

中国造纸学会秘书长春春昱介绍，蔡伦发明造纸术深受前人丝絮生产工艺的影响。古人用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将余下的恶茧、病茧用漂絮法制取丝绵；每次漂絮完的篾席上都会遗留一些残絮，用篾席多次漂絮，残絮便会累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纤维薄片晾干后剥离下来，便可用于书写。古籍把这种絮片称为赫蹄或方絮。方絮因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只能供达官显贵书写使用。

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主管御用器具制造期间，经多年摸索、实践，发明了用树皮、麻头、敝布、渔网等为原料制造植物纤维纸的办法。东汉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蔡伦将自制的植物

纤维纸献呈汉和帝，得到汉和帝的褒赏和赏赐，并下令在全国推广使用，纸张逐渐取代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丝帛，成为即使是平民百姓也用得起的书写用品。后人把蔡伦发明制造的这种植物纤维纸称为“蔡侯纸”。

蔡伦造纸工艺沿用至今

在“蔡侯纸”发明前，人们一直在寻找造纸的方法，全国多地考古发现的“灋桥纸”“中颜纸”“金光纸”等，就是西汉时期先人找寻、探索的具体反映。这些所谓“西汉纸”的考古发掘，使得蔡伦造纸术的发明曾一度受到质疑，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蔡伦并非造纸术的最早发明者，他只不过是改良了已有的造纸术。但是，更多的研究者用事实证明，“灋桥纸”等“西汉纸”只是纤维物的简单堆积，相较于制作原料，其物理、化学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因而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纤维纸”。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规范了工艺流程，使得这种创新技术易于学习、推广。在原料选择上，蔡伦主要利用废弃的麻料和易得的树皮，使生产成本得以大幅降低。在生产制作上，他根据植物纤维原料特性和手工作坊生产要求，创造了“挫、煮、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挫”即切断或砍碎原料，今天的造纸业谓之“切料”；“煮”是为了脱掉树皮、麻料中的果胶和木质素，等同于现代造纸工艺中的“脱胶”；“捣”就是将切碎、煮烂的原料春捣成浆，即今天造纸行业里的“打浆”；“抄”就是用篾席或丝网在纸浆里抄纸，今天的造纸行业仍沿用了这一工艺名称；“烘”是把“抄”出来



古法造纸的“抄纸”工艺。

（图片由作者提供）

的纸页摊平晾干，它是蔡伦造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

史籍记载，蔡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可见，蔡伦发明造纸术并非轻松所得，每逢节假日，他都闭门谢客，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工场作坊，学习、探寻与造纸工艺相关的方法与技术。真可谓，锲而不舍，天道酬勤。蔡伦之后近2000年的今天，世界各国造纸的主要工艺流程，基本上还是沿袭他发明的“蔡侯纸”生产原理，无非是把手工操作改成机械操作，继而把机械操作改进为自动控制，不断提高纸张的效率和质量。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纸张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应用，快速推动报刊、图书业发

展，给先进思想的传播和优秀文化的传承插上了翅膀，继而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诗里，画里，蔡伦故里，耒阳在这里欢迎你。”感受“千年纸都”的文化魅力，畅想“荆楚名区”的美好未来，特填《浪淘沙令》词一首，以表情怀：“怀圣耒阳游，胜景寻幽。三湘古邑玉白柔。竹海绿涛歌万顷，杜甫诗讴。//盛会聚名流，思绪悠悠。蔡伦造纸惠千秋。古法传承新创造，集智筹谋。”



“哲人石”：科学人文的点金石

□ 尹传红

接到一个邀约，周末参加科普出版创新发展论坛暨“哲人石25周年”庆祝活动，颇有些感慨。

在今天的科普界和科技界，但凡爱读书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哲人石丛书”的。其早期推出的《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美丽心灵——纳什传》《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等，都是一印再印的畅销书、常销书。1998年至今，25年时间里，“哲人石丛书”已经推出了153个品种。

就科普出版领域而言，这套书无论是在数量、规模 and 持续时间上，还是在选题范围与翻译质量上，都留下了难以超越的纪录，必将在中国科普图书出版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

就我这样的“阅读个体”而言，这套书也别有意味、独具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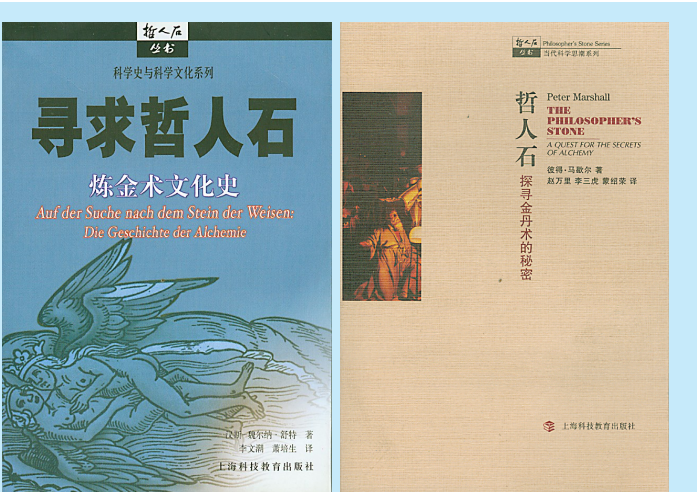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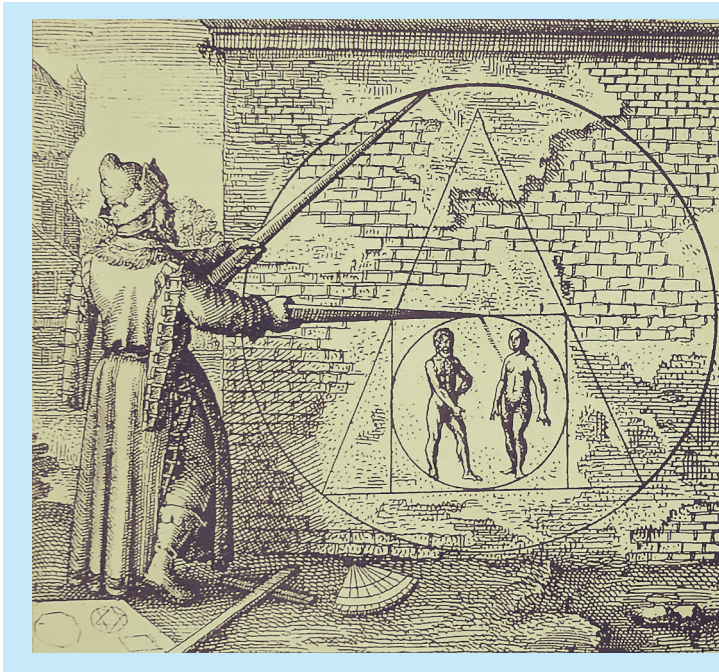
因为，从这套精致的“大书”酝酿伊始，到勃兴之时，到今天的蔚然大观，我一直都跟它的谋划者、推动者及执行者（编辑们）有着较多的交往与联系，深切感受过这个“创作”群体的智慧、严谨和执著，还有他们的付出。

因为，早年的我曾有幸受邀利用业余时间，以校译、审读和特约编辑的身份，为丛书中的近10个品种如《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我思故我笑——哲学的幽默一面》等做过“梳妆打扮”。

因为，从书中那些优秀的译著伴随着青年时代的我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授我知识，给我智慧，促我思索，高质量地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极大地推动了我的新闻工作和科普创作，堪称我的心智向导、业余良师。

敲打出这些话之时，与“哲人石丛书”相关的一桩桩往事又清晰地浮上了心头。

大约10年前吧，我曾就从书名目以及



左图描绘的是一位炼金术大师试图化圆为方。所附文字为：“用男人和女人构造一个圆，在此基础上画一个方，然后画一个三角形，再画一个圆，你就能得到哲人石。”（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供图）

科普与科学文化的若干话题，分别跟丛书最早的两位策划人卞毓麟和潘涛有过一番交流。当年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哲人石丛书”从内容上看就有别于传统的知识型科普，并且进一步拓宽了科普的范围，延伸至哲学、历史和艺术等领域，甚或有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因此有学者称，这种内涵更广、层次更高、在科学与文化之间架设桥梁的作品，恐怕只有用“科学文化”才能大致地予以概括，是不是这样？

卞毓麟回答：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把“科普”狭隘地理解为仅指普及科学知识了。许多人都已认识到，“科普”包含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

法、普及科学知识等诸多元素，而“哲人石丛书”与此是非常合拍的。所以，说它是一套优秀的科普读物并无不妥；说它是内涵丰富的“科学文化”读物也未尝不可。在这里，语义同事物的本质是很协调的。

而按照潘涛的理解，这一整套“哲人石丛书”应该是广义的科学文化。其中，《早期希腊科学》《科学哲学》《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分别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译品。后来，丛书又专门开设了第四个系列——“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推出的重要作品有如《科学的统治——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未来》《爱因斯坦思想史——德国科学的兴

衰》《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等。

当年“哲人石丛书”的主力编辑之一、现在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则这样概括：“哲人石丛书”的大舞台以科学为“支点”，在文化的“圆”内做文章，定位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随着科学的细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日益严重，科普图书肩负的一项重任就是要把两者勾连起来。她特别提到，“哲人石丛书”中跟“哲人石”相关的两本书《寻求哲人石：炼金术文化史》《哲人石：探寻金丹术的秘密》，恰恰就担当了“勾连”的角色。

“哲人石丛书”这个名称是潘涛首先提出来的。起初他考虑将丛书定位为“汉译当代科普名著”之类，并且明确针对中高端文化程度 的读者。不过，他又喜欢琢磨科学史，当年考虑从书名时自然注意到philosopher’s stone跟近代化学史的关系。《辞海》1999年版里，有“哲人之石”条；2009年第六版，则改为“哲人石”。考虑到叫“点金石”有点俗气，叫“哲人石”就像炼金术那样，有点神秘感。由于在心灵酝酿“哲人石”多年，于是灵机一动，提议干脆就叫“哲人石丛书”吧。

“哲人石”是中世幻想中有 点铁成金之功、收祛病延年之效的“魔石”。卞毓麟进一步阐释：“哲人石丛书”是针对读者渴求时代感强、感染力深的科普精品而策划引进的。这套书以“哲人石”冠名，既象征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也隐喻着科普图书对科学文化的促进效应。自不待言，追求完美的“双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出版人永远的“梦”。出版，作为一种产业，就经济效益而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至于社会效益，其出发点在于社会责任感。相对于“利润最大化”而言，这也许可以称之为“责任最大化”吧。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里醒目位置上看到的一句话：“愿做科教兴国马前卒”。那是也亲身参与了“哲人石丛书”谋划、拍板的老社长翁经义确定的“社训”。当年，这位很有眼光和格局的出版家还撂下了这样一句话：就算赔钱，留下一批好书也值了！

